◈纵　横

红旗渠的收据与账单

人们难以忘怀为红旗渠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而更值得大家敬佩的是，历时10年、投资几千万元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去过红旗渠纪念馆的，很难不对一口黑色木箱子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60年代修渠时的炸药箱，外观平淡无奇，盖子内壁却贴着一张字条，泛黄斑驳的纸页上，“收据”两个字隐约可辨。这是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股股长彭士俊，常年驻守工地，衣物无处存放，后来由财务部门作价，买了个废弃的炸药箱。彭士俊怕影响不好，干脆把收据贴在箱子上。

这张收据条，只是红旗渠账目明晰、制度严密的一个缩影。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按照这些具体的数字，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当年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者们，像一面镜子，给我们做出了典范。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2015年4月5日《深圳商报》罗辉　双瑞）

英国：傻瓜式的管理智慧

英国人善于做规矩。规矩能够实行，必须简单。

英国的户外垃圾箱总是并列三个，箱体外没有文字说明，只有图案标识：一个是玻璃瓶，一个纸袋，一个屑屑粒粒的点，掷弃者一目了然，知道归类抛物，哪怕不识字的，都会各得其所。

在英国，哪怕伦敦，大多数道路都能泊车，哪怕单行道、哪怕窄路，但收费泊车位的道旁，都有收费器，没有收费人。车主交完费后，收费器会吐出凭证，你将凭证贴在车窗前，巡检者半小时一趟，远远一瞄，就知道谁没有交费，效率极高，难度极低。

英国的出租车有两类：一类是mini，只能电话预约；一类是taxi，可以在马路上扬招停车载客的。mini车的款式各异，属于私家车揽客，该车主必须申请，专管部门批准，交一笔税费，然后在车窗前贴有统一标识。taxi出租公司管理，不管哪个公司的车，款式统一：黑色、方头、枕头面包似的，上海人所谓的老爷车。如果非此款式的车停在路边载客，任何人都会发现，任何人都会举报。众目睽睽，违规者无藏身之地。

一百年前在上海英租界里，黄包车是公共车，漆以黄色，可以路上停车拉客。私家包车漆以黑色，路上截客、接客属于违规，巡捕抓你，上海话“黑车”就出典于此。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将规则简单化直至傻瓜化。规则越简单，执行越容易，监督越便利，监督成本越低，违规难度就越高。这就是英国人的管理思路。（2015年总第16期《群众》李大伟）

政策体系须做到两个“顺应”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重要的政策体系必须同时做到两个方面的“顺应”，既顺应民意，能够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同时又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如此方具有积极长远的社会效应。但并不罕见的一种现象是，民意与时代潮流有时会出现某种脱离的现象。一方面，在制定政策体系时过于强调民意问题，将之放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却脱离了时代潮流及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在制定重要制度政策体系时，脱离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如基本民生需求，过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

重要政策体系出现顺应民意和顺应时代潮流分离的情形，必定对社会发展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它削弱或窒息发展活力，催生社会矛盾，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畸形化发展现象，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重要的政策体系只有既顺应民意同时又顺应时代潮流，方能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进一步说，应当将是否顺应民意和是否顺应时代潮流这两项内容作为判断重要政策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基本标准。（2015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吴忠民）

◈观　点

“多维度高风险社会”的应对之策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维度高风险社会”，完全依靠传统的政府行政治理框架和手段不仅无法有效地预防风险，更无法有效地降低风险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和风险后的次生灾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但又超越政府的、全社会性的、基于“多维度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险应对制度框架。

现代风险已经超越了政府和专家的能力，政府和专家很难准确掌握风险的信息和应对风险的方法。传统社会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其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社会的风险虽然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理论上讲也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实上其发生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我们排除了政府不作为，没有管制、腐败等因素，结论仍然如此。

首先，一个局部的小的风险可以演化成大范围的灾难。现代社会趋利性极强，市场制度设置追求每个细节的盈利，生产分工细致。每个细节的局部小风险，在工业化生产的分工而又相互联系下，在不同系统中进行传递，而导致风险的放大。因此，任何一个局部的风险防御都是社会整体的风险防御。

其次，现代风险往往会超越社会的预防处理能力。一旦社会出现大的风险，我们会发现政府往往没有很好的准备而且应对能力也显不足，社会和媒体也会把矛头指向政府。实际上，现代风险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破坏力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和政府对于风险发生的信息掌握和处理能力的不足，即使对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再次，风险的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应对现代风险方面，认为政府和专家能够准确掌握风险信息和应对风险方法的思路是不对的。现代风险已经超越了政府和专家的能力，这就是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

防范风险的关键是要发育出社会普遍接受的应对风险的文化，同时要建立全民性、参与性和包容性的风险应对体系。

其一，要普及个人风险意识，不能认为有了风险就是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因为，只要社会中的个人具有较高的个人风险意识，他们就会主动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其二，由于现代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个人化的特点，风险防范的制度安排和措施就无法只依靠个别专家来制定，而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参与机制并不是简单的被征求意见，而是在权力和利益平等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险社会治理的根本是消除社会的腐败、不平等等问题。

其三，现代社会风险的发生不断冲击传统保险的基本原则，人们依靠政府和寄希望于保险对风险进行补偿的心理与现代社会的风险特点极不相称。治理现代风险要基于风险发生的个体性和不确定性这一重要的原则，要合理地配置政府、市场和社会个体的责任。建立一个每个个体都对自身行为负责的机制，是现代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2015年9月上《人民论坛》李小云）

思想家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我们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理想信仰、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回顾历史，今天令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代的需要。中国历史上不知产生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

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

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功臣。善待思想家，正像善待科学家一样，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2015年第8期《浙江社会科学》俞可平）

◈评　论

重视人口新动向传递的信号

近日，辽宁省公布了目前的人口现状。数据显示，辽宁是全国唯一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地区，人口净减少将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人口结构上，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4年，常住人口性别比已经远低于全国水平。

长期以来，论及当代中国的人口形势，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基数大、增长快，这样的总体判断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也得到了历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的印证。在此背景下，辽宁多少显得有些“反常”。辽宁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大代表性，其人口负增长的确切原因是什么，还有待更详细的数据来解答。但是，这样的变化趋势所释放出的关于人口形势的信号是严肃的，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个区域内的人口数量与结构，描述的是一个动态的复杂情况，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既包括一定时期内的既有人口状况，也包括基于当地的客观条件以及人口变化的趋势对未来做出合理预期。在各种意义上，人口状况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其影响周期长，必须从长计议，很难“应急”。从公共资源的配置，到整个地方的发展规划方向，具体到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都少不了对人口状况的掌握与评估，人口因子就是一个公共决策的基础性参数。

近年来，与人口相关的议题在公共讨论中频频出现，分别从劳动力、教育、婚育和养老等社会角度切入，实际上都指向了人口这一基础。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加剧以及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热点的聚焦下，相关转型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人口现状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社会舆论和一些公共决策者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意识。

从目前所掌握的相关信息与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趋势，已经很难仅用人口持续增长或者下降这样的简单结论来形容。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在2010年——2014年间，包括重庆、湖北和四川在内的6个中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了常住人口的负增长，而辽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2011年起连续三年为负值；与此同时，北上广等城市的人口却在“爆炸式”增长。

具体到人口发生明显变化的原因，各种统计数据传达的信息表明，经济因素的影响蔚为可观。与新闻中报道的东北人口大量外流相反，“一线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强烈吸引并没有衰减之势。直接决定一个地区婴儿出生数量的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生育意愿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挂钩的特点——总体上看，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区性差异十分显著，呈现出多样化的新状况。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的人口依据上，其实仍然缺乏足够精细的掌握，问题的展开仍不明朗。换言之，在人口这个复杂的大问题上，究竟该对当前的整体形势下怎样的判断，社会各界实际上还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基于人口依据进行的制度设计和调整，遇到诸多障碍和困难。

人口问题牵涉极其复杂，老龄化、劳动力供给、性别比例、自然增长率、地方的人口形势等，既是人口问题的重要数据，同时又只是一个侧面。中国人口问题究竟面临怎样的态势，人口政策该不该有大幅调整，首先都需要有一个对人口问题的科学的总预期或者总依据，在此之下，研究讨论才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展开。（2015年9月19日《长江日报》长评）

◈视　界

印度裔高管“攻占”美国硅谷背后

硅谷的印度裔高管已经有点数不过来了。其中就有红透半边天的谷歌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以及微软历史上第三任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仅仅这两家公司，印度裔高管就已经掌管了8000亿美元的市值。

硅谷高管印度“土产”

不同于一些族裔高管都是移民二代，这一波登上硅谷权力顶端的印度裔高管，都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大多数都是在印度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后来美的。

比如，皮查伊出生于印度第四大城市钦奈的一个普通家庭，住在一个两房公寓里，他的父母连个电视机都买不起。纳德拉则在1967年出生于印度的海德拉巴，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大学获得了电子和通信的工程学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

硅谷的传奇式印度高管比比皆是，最早可溯源到1980年就来到美国的沙比尔·巴蒂亚（Sabeer Bhatia）。巴蒂亚是hotmail的发明者，1968年出生于印度昌迪加尔，后来在加州理工念书。

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软件公司之一Adobe的首席执行官山塔努·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在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念完本科，来美国博林格林州立大学读了计算机硕士。演示文档共享平台“SlideShare”联合创始人兼CEO拉什米·萨哈（Rashmi Sinha），出生于印度阿拉哈巴德，后在伯克利大学深造。太阳微系统公司，就是那个发明了Java语言的公司，其联合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也是在印度出生，于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受教育。思科首席技术官帕德马锡·沃里奥（Padmasree Warrior），此前还担任过摩托罗拉的首席技术官，同样来自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

谷歌除了皮查伊，还有一位印度裔高管：企业业务总裁艾米特·辛格（Amit Singh），是他在2001年重塑了谷歌搜索引擎的核心算法。辛格在印度北方邦出生长大，也是在印度理工学院的罗克分校读书，后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德卢斯大学念计算机科学研究生。

古老的印度学徒传统

同属亚裔的印度和中国工程师，在美国其他族裔眼中的印象都高度一致：成绩优秀、技术拔尖，但不擅长体育，总体比较内向，喜欢和自己人扎堆。

但中国工程师能在硅谷真正出头的少之又少，像百度最近高薪挖角的吴恩达可能是一例。1976年出生的吴恩达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国际上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名震硅谷。但是吴恩达是出生在伦敦、于香港和新加坡接受教育的华裔，并非像很多印度高管那样成年后才移民来美。

硅谷一个传统族裔权力结构是：大量担任技术研发任务的中国工程师，往上是一群印度中层，再往上则是美国本地白人高管。现在，印度人已经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天花板瓶颈”。

中国工程师私下对印度同事最大的抱怨，就是认为印度人“互相偏袒”。这些“声讨”当然有中国工程师受压抑的情绪化，但在管理学中，这种“印度式管理”倒也确有出处。

新罕布什尔南方大学一项研究也比较了跨国企业中，印度经理和美国经理的差别，称“印度高管的风格是，上级会非常真诚地替下属考虑，两者之间往往会建立极强的忠诚感，甚至超越了薪水回报”。这种发源于印度手工艺行业的古老传统，在推动印度裔工程师融入硅谷时显得马力十足。早在沙比尔·巴蒂亚时代，印度工程师和企业家就开始在硅谷拓宽势力范围，靠一代代的积累建立印度企业家在美国的超强人际网络。

三十多年前，第一代成功的硅谷印度创业家，就已经意识到外来移民在美国发展的难处和障碍，开始毫无保留地帮助前来追随的印度老乡。经过几代印度企业家们的努力，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硅谷创造出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印度圈生态，包括引荐人脉、设立天使投资，专门帮助初来乍到的印度创业者。

前几代印度移民另一个突破性成就是，打破了美国人对印度人的刻板印象，认为印度人只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而不是杰出的管理者。《印度经济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第一代硅谷的印度移民成功打碎职业上的玻璃天花板后，他们还决定要从此互相扶持着前进。他们意识到后来者将面临同样的困境，要想突围，只有抱团。由前人来为后来者打破更多障碍，提供更多经验，开启机遇之门”。

录取率不到2%的印度理工学院

仅仅靠提携，可能能进入大公司混碗饭吃，但要成为“技术至上”的科技公司高管，还是要靠超强实力。皮查伊能当上谷歌CEO，首先还是因为他发明了chrome。

事实上，许多杰出的印度工程师确实是仅凭个人实力，就能让整个互联网世界心服口服。根据2014年的数据，目前硅谷大概有15%的创业公司都是由印度裔创办。

在美国，印度人实际上已经成为由移民创办的科技创业公司中的最大族裔，超过了英国、中国和日本三个族裔加起来的人数。

从1999年至2012年，虽然印度雇员只占硅谷整体雇员人数的6%，但印度人在硅谷创建的公司占全硅谷的比例从7%飙升到了15.5%。创业公司是最能代表创新精神和技术实力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些优秀的印度裔工程师，其中大概有一半都来自于同一所印度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

这是皮查伊和许多其他印度高管的母校，被誉为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录取率不到2%，比哈佛大学录取率还低得多。或许把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普利斯顿大学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

据调查显示，在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硅谷，约2000个新生企业中，约有四成是由印度人开办的，而其中一半是印度理工学院培育出来的人才。

从上个世纪70年代科技产业腾飞的黄金时期起，每年印度理工学院70%的毕业生会选择出国，且大部分都落脚美国。过去50年，印度理工学院总共诞生了17万毕业生，留在美国的就超过3.5万人。（2015年8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下木）